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Theory and Research
(Second Edition)*

主编

Lawrence A. Pervin

Oliver P. Joh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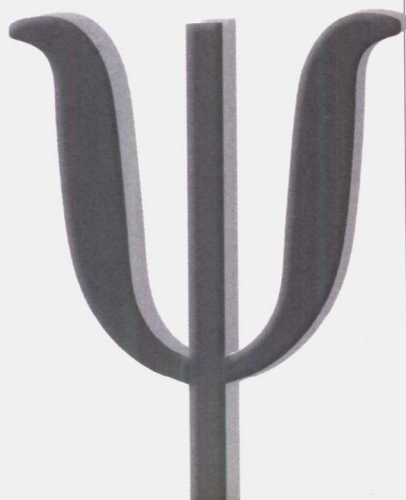
黄希庭 主译

人格手册：

理论与 研究（第二版）

下 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Theory and Research*

(Second Edition)

人格手册：理论与研究

(第二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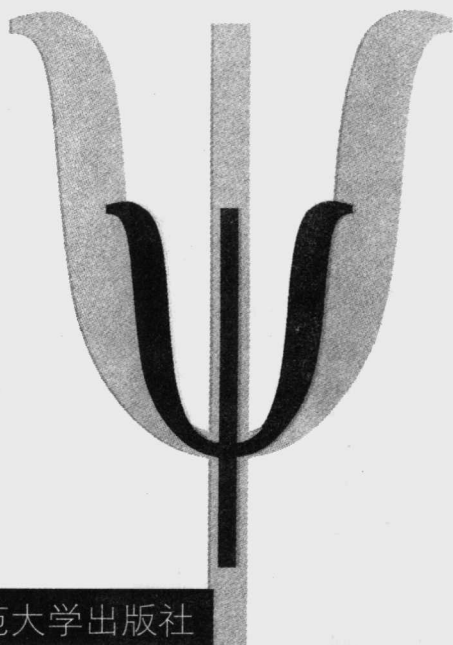
(下册)

主 编

Lawrence A. Pervin

Oliver P. John

黄希庭 主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格手册:理论与研究/(美)珀文,(美)约翰主编;
黄希庭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12
ISBN 7-5617-3434-4

I. 人... II. ①珀... ②约... ③黄... III. 人
格心理学 IV. B8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6396 号

人格手册:理论与研究(上、下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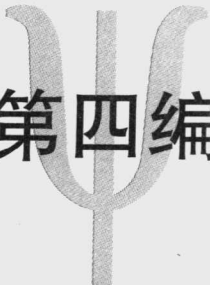
主 编 Lawrence A. Pervin
Oliver P. John
主 译 黄希庭
责任编辑 张 捷
责任校对 李雯燕 郭绍玲 乔惠文
封面设计 黄惠敏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传真 021-62860410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华东师大校内先锋路口
业务电话 上海地区 021-62232873
华东 中南地区 021-62458734
华北 东北地区 021-62571961
西南 西北地区 021-62232893
业务传真 021-62860410 62602316
http: // www. ecnupress. com. 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印 刷 者 宜兴市德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6 开
印 张 64. 25
字 数 1 187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3 年 12 月第一次
印 数 5 100
书 号 ISBN 7-5617-3434-4 / B · 188
定 价 93.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第四编

内 容 领 域

第十六章 气质：特质心理学的一个新范例

Lee Anna Clark 和 David Watson 依阿华大学 399

古代历史

气质是一个古老的概念。早在公元前 5 世纪,古希腊医生就认为健康依赖于四种“体液”的协调混合。到了公元 2 世纪,罗马医生 Galen 进一步提出,某种体液占优势就会造成相应的特征鲜明的情绪风格或气质,进而分别构成了四种相应的基本人格类型的核心(事实上,“气质”这个词来源于拉丁文“混合”,于是,不同的体液混合被等同于不同的气质。Digman,1994)。血液占优势可导致“乐天的”或欢快的、活跃的气质;黑胆汁占优势能导致“忧郁的”或沮丧的气质;黄胆汁占优势会导致“易怒的”或生气的、凶暴的气质;粘液占优势则导致“迟钝的”或平静的、消极的气质。

这些古代的观点对当代气质理论仍然存在这两个方面的影响:(1)生物学因素是可观察的特征的基础;(2)情绪是气质的核心以及关键特征。Allport(1937)从人格结构出发,提出了一个抓住其本质特征的定义。

气质指个体情绪本质的典型现象,包括他对情绪刺激的敏感性、习惯的反应强度和速度、最常有的心境性质以及所有的心境波动和紧张的特性。这些现象被看作是依赖于体质的特点,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遗传。(p. 54)

正如我们后来将讨论的那样,今天的研究者考察的是 5-羟色胺缺乏、去甲肾上腺素系统或中脑缘的多巴胺通道,而不再是体液之间的不均衡,但是认识到行为部分地是体质特征的一种功能不失为了不起的观点。虽然关于气质的精确定义以及气质同人格的区别(本章不涉及这个问题)方面还存在着争议,在 Allport 之后,对于这些概念来说,情绪的经验 and 情绪的规律是内在的这一观点现在已得到广泛的认同(参见, Digman, 1994, 关于气质概念的简史和定义的深入讨论)。 400

希腊模型的第三个方面也应当承认。对四种主要气质的观察显然同现代理论家



Hans Eysenck 所提出的由神经质(或情绪稳定性)和外倾性这两个基本人格维度所构成的四个象限非常吻合。可以说,稳定的外倾性是乐天的,不稳定的外倾性是易怒的,不稳定的内倾性是忧郁的,而稳定的内倾性是迟钝的(Eysenck & Eysenck, 1975)。虽然关于“在外倾性和神经质之外还有什么?”这一问题还存在长期的争论(Zuckerman, Kuhlman, & Camac, 1988),但这两个维度已普遍为所有主要气质和人格模型所接受。

现代气质研究的简史

除了气质反映了以生物学为基础的情绪反应的个体差异这一观点外,现代气质理论也接受了 Allport 关于这些生物学上的差异是先天的而且构成了成熟人格得以发展的基础的观点。由于版面限制,我们不能对各种已提出的气质模型和测量进行全面的考察,但作一个简要的回顾是有教益的。大约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开始,Thomas、Chess 和 Birch (1968; Thomas & Chess, 1977)提出的九维度结构成为儿童期气质研究的主流。已发展出大量的衍生测量已覆盖了从出生(Medoff-Cooper, Carey, & McDevitt, 1993)到青少年(Windle & Lerner, 1986)的发展范围。

逐渐累积的研究已经表明这种模型的重大局限,比如一些维度是不可信的,并相应地在使用因素分析时少量维度(5 个或许 7 个)上有重复(Martin, Wisenbaker, & Huttunen, 1994)。其结果表明,这种模型似乎应让位于新的结构(例如, Rothbart, Ahadi, & Hershey, 1994, Rothbart, Derryberry, & Posner, 1994),尽管如此,它在提出儿童时期的行为是结构化的、可测量的,在后来的人格发展系统地相关的重要观点方面获得了成功。除了测量上的进步,这个领域目前的大量工作是试图从生物学基础的角度来理解婴儿和儿童时期气质的表现型维度,并考察它们从幼儿期到成人人格的连续性和发展。尤其是依据 Gray (1982, 1987)和 Eysenck (1967, 1997)的工作而获得的婴儿和儿童的数据详细地说明了这两个方面的努力(例如 Rothbart, Derryberry, & Posner, 1994)。

若干成人气质的研究者从 Pavlov 的中枢神经系统(CNS)特性理论中发展出了他们的模型。其中最著名的是 Eysenck 和 Strelau。Strelau 的模型(1983; Strelau, Angleitner, & Ruch, 1990; Ruch, Angleitner, & Strelau, 1991; Strelau & Zawadzki, 1995),虽然在美国还没有得到广泛认同,但对欧洲的气质研究却已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这两种模型都引发了大量以学习为基础的实验研究。这两种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中枢神经系统特性的个体差异(如兴奋强度,唤醒能力)影响着人格,以及这种联系可以通过对不同的条件反射参数作为人格的功能而产生差异的观察而被检验。虽然这些理论

是有助于将生物学变量和气质维度联系起来的工具,但是它们似乎将为认知和情绪的神经科学的研究中产生的更精确更复杂的模型所取代。

Gray(1982,1987)也提出了一个气质的生物学模型,该模型在几个重要观点上同Eysenck的研究相重合。Gray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对动物的药理学研究,极大地影响了成人人格或气质维度的理论构建。然而,应当指出的是,除了精神病学的研究,他的模型很少直接在人类身上得到实验验证,也许是因为难于对假设的神经心理系统进行评价所致。相对而言,Buss和Plomin(1975)提出的一个气质模型虽然理论影响相对较小,但却因EASI气质调查表(EASI Temperament Survey)而在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他们发展出的这个调查表以测量他们所提出的情绪性、活动性、社会性和冲动性四个维度。随着这些领域内其他启发性工作的开展,这两个模型逐渐被更新的研究所取代。

结构化的“特质”取向

401

与发展主义者和欧洲的气质研究者相比,对于这些依据生物学基本概念的气质研究,美国的人格主义者在整个20世纪基本上没有多大兴趣。特质心理学家更愿意把注意力集中在结构分析上,以创建人格特质的综合性描述的分类学为目标,往往忽略对他们所确定维度的原因的探究。对于结构的重视招致了一个广泛的批评,即特质心理学仅仅对行为提供了一种无结果的、静止的描述,而不是对它真实的解释(参见,Liebert & Spiegler,1982;Mischel,1968,1990;Pervin,1994)。这种批评在20世纪中叶随着行为主义的兴盛逐渐增强。以B. F. Skinner为首的行为主义理论家认为,通过推断而得到的心理构念(比如特质、习惯和本能)是无聊的伪解释,这些伪解释实际上只表达了对行为的过度描述。例如,Skinner(1953 p. 31)认为,“当我们说一个人吃东西是因为他饿了,抽很多烟是因为他有抽烟的习惯,打斗是因为他有好斗的本能,表现出类拔萃是因为他智力超群,或者弹得一手好钢琴因为他杰出的音乐能力。看起来我们涉及到了原因,但一分析,就可证明这些短语仅仅是累赘的描述。”

Mischel(1968)提出证据表明,特质概念解释了在行为中较少的几种差异,但甚至尚未提供一个对行为有用的总结性描述,此时它却促进了特质研究的蓬勃发展。Mischel的抨击引发了存在已久的“个人—情境争论”,该争论一直持续到80年代还在进行(Epstein & O' Brien,1985;Kenrich & Funder,1988;Mischel & Peake,1982)。尽管该争论最终涉及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论战的核心还是围绕着两个中心问题展开的:首先,特质是否具有基本的心理学意义上的“真实性”,还是仅仅反映了人们为了满



足他们预测和控制的需要而强加于事实的认知解释？第二，对于重要的现实世界标准的预测来说，特质概念是有用的吗？虽然关于特质理论的批评依然不能令人信服（例如 Pervin, 1994），但在经历了近 20 年的理论和实证争论之后，特质心理学家才最终集聚了足够的证据对这两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特质表示现实的实体，它能用来对重要的现实世界作出预测。

气质和结构取向的融合

解决这个争论的关键因素在于，有关人格的主要特质代表了气质的基本心理生物学维度的认识日渐增多（例如，Eysenck, 1992, 1997; Tellegen, 1985; Watson & Clark, 1993）。这种认识的出现无疑反映了几个因素，我们在这里强调其中三种。第一，大量研究证明大多数人格特质具有实在的遗传基因成分（例如，Eysenck, 1990b; Loehlin, 1992; McCartney, Harris, & Bernieri, 1990; Plomin & Daniels, 1987; Tellegen et al., 1988），我们会在后续部分中总结这一证据。这些资料显示，特质的基本表现型描述是更令人满意的行为的基因型解释。

第二，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期迅速积累的证据确定了人格的主要维度与情感经验中的个体差异紧密相关，神经质和外向性尤其如此（例如，Meyer & Shack, 1989; Tellegen, 1985; Watson & Clark, 1984, 1992b, 1997; Watson Wiese, Vaidya, & Tellegen, 出版中）。这个证据提供了同心境和情绪的神经生物基础有关的丰富文献，以及同气质研究之间的系统联系，气质长期以来就被认为具有情绪基础。因而，这方面的发展有希望将人格、心境和情绪，以及气质这三个领域的研究综合起来。由此，在这些领域中关于个体差异的遗传学和生物学原因探究的广泛资料有助于确定特质是真实的，并且表现了行为的真正原因，而不仅仅只是描述性的总结。

402 第三，在经历了数十年似乎微不足道的发展后，研究者把意见都聚集在人格特质一致认可的表现型分类上，结构研究终于开始出成果，我们将在随后叙述这一点（也参见，Goldberg, 1993; Watson, Clark, & Harkness, 1994）。这种发展使研究者能够把更多的注意集中在较少数量的且已得到一致确认的特质上，并把它们合并入更复杂、更精细的概念图式中去，产生出更细致、更系统的假说，这有助于澄清现实世界与特质的相互关系（例如，Watson & Clark, 1984, 1992b, 1997）。因而，以气质为基础的范式的出现把特质心理学提高到了一个更成熟的科学地位，它首次展现出能够对人类个体差异作出综合解释的希望。

说到这点，仍然要注意很多作者继续对特质代表行为的非理论描述提出批评（参



见, Liebert & Spiegler, 1982; Liebert & Liebert, 1998)。例如, Westen(1996, p. 478)认为:“特质仅仅是描述性的,对人格是怎样的和为什么是这样的,几乎毫无见解……它们可以描述甚至预测行为,但它们不能解释行为。”同样, Baron(1998, p. 488;原文着重强调)认为:“特质取向……试图描述人格的关键维度,但并不试图去确定各种特质是怎样发展或者怎样去影响行为的。”这些可能是旧的特质文献的明确特征,但这些批评者忽视了过去十年的非凡的发展。随着以气质为基础的范式的出现,特质目前能够为行为提供合理的因果解释,而不仅仅只是行为的描述。

研究气质的结构模型

“大三”作为一种结构框架

我们已提到人格主义者的意见近来已在人格特质一致认可的表现型的分类上达成一致。促成这种一致性的一个因素是认识到人格特质是按层次序列排列的,于是在强调少数几个一般的“超级因素”的模型和包括数量巨大的狭窄的特质的模型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参见, Digman, 1997; Jang, McCrae, Angleitner, Riemann, & Livesley, 1998; John, 1990; Watson et al., 1994)。在这个等级的顶点是诸如神经质和外向性的“大”特质,它们构成了超级因素模型。一些非常广泛的个性倾向,能够在这个层次结构的下一级水平上被分解为几种在实验中相关的特质。例如,外向性这个一般特质能被细分为果断性、合群性、愉快和精力这样的更具体的方面(Depue & Collins, 出版中; Watson & Clark, 1997)。然而,这些方面能更进一步分解为更具体的结构,包括非常狭窄的特质(例如健谈)和行为习惯(Digman, 1997)。

当然,需要在人格的综合性评价上来考虑所有这些水平。我们之所以把注意主要集中在广泛的高级超级因素上,是因为在层次结构的这个水平上可获得非常广泛的数据。例如,关于外向性和神经质的基因基础的证据比其他任何特质的证据多得多(Loehlin, 1992; Viken, Rose, Kaprio, & Koskenvuo, 1994)。同样,对一般特质的生物基础的研究也比低级方面的生物基础研究更为深入(例, Depue, 1996; Depue & Collins, 出版中; Eysenck, 1997; Tellegen, 1985)。因此,我们将使用这些超级因素来作为我们基本的组织框架,但在必要时也会考虑到同低级方面相关的数据。

组成这个层次结构的顶点的基本超级因素是什么?在这一点上意见还远远没有达到一致,因为这个领域的支持者分裂为两种相互区分但又紧密相关的模型:大三(例



如, Eysenck & Eysenck, 1975; Gough, 1987; Tellegen, 1985; Watson & Clark, 1993) 和大五(例如, Digman, 1990, 1997; Goldberg, 1993; John, 1990; McCrae & Costa, 1987, 1997)¹。因为两个相关的原因, 我们的讨论将以大三模型为中心。首先, 该模型在这个领域内长期指导着我们的思想, 并最终引导我们发展出了我们自己的大三工具——一般气质调查(the General Temperament Survey, GTS; Clark & Watson, 1990)。第二, 秉承这种研究传统的研究者已经非常注重对这些超级因素的神经生物学基础进行详细的解说和分析(例, Eysenck, 1992, 1997; Tellegen, 1985), 相比之下, 大五的提出者更注意人格的表现型(phenotypic)描述。但是必须承认, 大五研究者近来在这些维度的生物学原因探究上表现出很大兴趣, 这个差别正在迅速缩小(例, Jang, Livesley, & Vernon, 1996; Jang et al., 1998; McCrae & Costa, 1996; Riemann, Angleitner, & Strelau, 1997)。

正如它的名字所标明的, 大三模型就是基于神经质/负情绪(N/NE)、外倾性/正情绪(E/PE)和去抑制对强制(DvC)这三个广泛的超级因素的论述而提出的, 而且对于描述人格层次结构的最高水平来说是必要的。简单说来, N/NE 反映的是一个人在何种程度上把世界知觉为有威胁的、不能预知的、使人痛苦的个体差异。在这一项上得高分者的经验提高了负情绪的水平, 继而报告了一大堆问题;而那些在此特质上得低分者则是平静的、情绪稳定的以及自我满足的。E/PE 涉及个体试图控制环境的意愿。得高分者(例如外向的人)倾向于活跃的生活、精力充沛、充满热情、快乐和充满信心。作为这个一般取向的趋势的一种表现, 他们还寻求并喜欢同他人交往, 容易接受他人的意见。相比之下, 在这个维度上得低分的人(如内向的人)往往是含蓄的、疏于社交的, 他们报告了更低的精力和信心水平。最后, DvC 反映了在控制之下不受控制态度的行为趋势的个体差异。去抑制的个体是冲动的、有一点鲁莽, 主要受即时的感情和感觉支配。相反, 强抑制的个体仔细计划、避免冒险或危险, 他们行为受到长期意义的更强的控制(参见, Watson & Clark, 1993; Watson et al., 1994)。

这个模型来源于 Eysenck 和同事们的开创性工作(例, Eysenck, 1967, 1992, 1997; Eysenck & Eysenck, 1975)。如前所述, Eysenck 富有创见地建构了一个影响广泛的两因素模型, 包括神经质(对情绪稳定性)和外倾性(对内倾性)这样广泛的特质, 当它们交叉时, 就产生了古希腊人提出的四种气质。随后进行的对问卷项目扩展的联合分析促使了对第三种广泛维度的确认, 命名为精神质(尽管有这样的名字, 但最好还是把它看作精神病学或去抑制的测量;参见 Digman, 1990; Watson & Clark, 1993)。Eysenck 的人格问卷里包含了对这第三个超级因素进行评价的量表(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EPQ, Eysenck & Eysenck, 1975)。



其他理论家也假设过非常相似的三因素模型。Tellegen(1985)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包括负情绪性(比较神经质)、正情绪性(比较外倾性)、和强制(与精神质有强的负相关)。我们(Watson & Clark, 1993)接着也阐述了一个极为相似的模型,因素各自命名为负气质、正气质和去抑制(对强制)。此外, Gough(1987)在重新编定加州心理测验(California Psychological Inventory, CPI)时引入了三个高阶的“向量”: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内在性(Internality)和遵守规范(Norm-Favoring),它们各自反映了神经质、外倾性和精神质的最低点。

最后, Cloninger(1987)也阐述了一个三维模型,包括伤害避免(Harm Avoidance), 奖励依赖(Reward Dependence)和 novelty 寻求(Novelty Seeking), 并且在重要的方面与其他图式是类似的。然而, 构成 Cloninger 三维人格问卷(Cloninger's Tridimensional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TPQ; Cloninger, 1987)的量表没有显示出与其他理论家(如 Health, Cloninger, & Martin, 1994; Waller, Lilierfeld, Tellegen, & Lykken, 1991)论述的维度相融合的显著水平。此外, 分析揭示出奖励依赖实际上可以归为两个互不相关的因素。于是, Cloninger(Cloninger, Svrakic, & Przybeck, 1993)修订了他的测量工具已包括四种气质因素, 但并没有明确地提出一个修改的理论来对此作出解释。

因此, 除了 Cloninger 的框架之外, 所有的模型似乎都在定义一个单一的共同结构。例如, Tellegen(1985)证明了他的因素和 Eysenck、Gough 两人的因素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融性。同样, 我们也获得了我们的因素和 Eysenck、Tellegen 的因素之间的高相关(Watson & Clark, 1993, 1997)。最后, Gough(1987)报告了他的高阶向量和 Eysenck 量表之间有本质的相关。为了得到进一步证明这个重要观点的材料, 我们对 250 名依阿华大学的本科生中施测了 EPQ, CPI 和我们自己的 GTS 这三种假设的大三测量工具。然后我们从这些工具中对每个超级因素提取了三个高阶量表, 并对这 9 个高阶量表进行主成分分析(斜交平方多重相关)。正如所期望的那样, 三个因素清晰出现, 并做了极大方差法旋转。

因素负荷结果(见表 16.1)明显地表明这些测量工具定义了一种共同的三维结构。通过三个测量工具的量表严格定义出这三个因素, 并且可以轻易地确认这三个因素分别就是 E/PE、N/NE 和 DvC。然而, 应当注意的是, 同该领域的早期研究(如 Watson & Clark, 1993)一致的是, DvC 维度的标记一般只表现出融合的最弱水平。另外, GTS 和 EPQ 量表表现出最强的融合, 与此一致, 它们作为基础维度的最好标记出现。



表 16.1 出自 EPQ、CPI 和 GTS 的高阶量表的最大旋转因素负荷

量 表	因素 1	因素 2	因素 3
EPQ 外倾性	.84	-.09	-.06
GTS 正气质	.71	-.13	-.25
CPI 内在性	-.73	.06	-.13
GTS 负气质	-.09	.84	.09
EPQ 神经质	-.16	.81	.07
CPI 自我实现	.02	-.66	-.16
GTS 去抑制	.19	.20	.73
EPQ 精神质	-.05	.09	.64
CPI 遵守规范	.29	-.05	-.61

注：N=250，|.40| 及以上的负荷量用粗体表示。EPQ，艾森克人格问卷；CPI，加州心理测验；GTS，一般气质调查。

将大三和大五联系起来

如前所述，大三和大五模型实际上定义了相同的特质结构。即使我们用大三来作为我们主要的结构框架，我们也要善于利用通过多种大五测量工具所收集到的大量资料。但是，为了把这些发现吸纳入我们的框架中，我们就需要考虑这两种分类之间的关系。

大五模型最初是通过一项对试图理解特质描述词的自然语言的系列研究而提出来的（参见 Block, 1995; Digman, 1990; Goldberg, 1993; John, 1990）。对这些形容词所做的大量结构分析一致表明了五种广泛的因素：神经质（对情绪稳定性），外倾性（或伶俐性），责任性（或可靠性），宜人性（或对抗性）和对经验的开放性（或想象、才智或文化）。这相同的五个因素在自评和他评的研究中（例如，McCrae & Costa, 1987），在对儿童和成人的分析中（Digman, 1990, 1994）以及在跨多种语言和文化中（例，Ahadi, Rothbart, & Ye, 1993; Jang et al., 1998; McCrae & Costa, 1997）都出现了，证明了这个结构是非常稳定的。

简而言之，这些数据有效地表明，这五个因素代表了一个扩展了的并且更具区分性的大三的版本。更加引人注意的是，就本质而言，大五因素中的神经质和外倾性分别等同于大三中的 N/NE 和 E/PE 维度，目前这已非常明显（例如 McCrae & Costa, 1985; Watson & Clark, 1992b, 1993; Watson, Clark, & Harkness, 1994）。因而，这两种分类法共享了一个由 N/NE 和 E/PE 共同组成的“大二”。



此外,大三的 DvC 维度被证明是(低)责任性和宜人性的复杂结合;即,去抑制的个体往往是冲动的、快乐的、鲁莽的(低责任性)、不合作的、欺诈的、支配的(低宜人性)(例如, Digman, 1997; Eysenck, 1997; John, 1990; Watson 等, 1994)。最后,开放性仿佛同所有的大三维度都毫不相关(McCrae & Costa, 1985; Watson et al., 1994)。综上所述,这些数据意味着能通过以下两点把大三转化为大五:(1)把 DvC 维度分解为责任性和宜人性这两个组成特质;(2)添加开放性这个补充的维度。

为了进一步弄清它们的关系,我们用 GTS、EPQ 以及修订的 NEO 人格量表(NEO-PI-R; Costa & McCrae, 1992a)和大五量表(BFI; John, Donahue, & Kentle, 1991)这两种大五测量工具来对 327 名本科生进行了评鉴(185 名来自于 Southern Methodist 大学[SWU], 142 名来自于依阿华大学;注: SWU 数据的初步分析是由 Watson 等人报告的, 1994)。我们首先提取出高级 EPQ 和 GTS 量表进行主成分分析;有三个因素可明确认定,并且进行极大方差旋转。然后我们计算了回归分数来评估每个被试在这三个维度上的占据量。接下来,我们用 BFI 和 NEO-PI-R 主量表重复了这个过程,此时我们计算出代表大五每个特质的因素得分。最后,我们计算了这些大三和大五因素分数之间的相关。

结果见表 16.2。这些数据再一次清晰地证明了两种结构框架具有一种共同的 N/NE 和 E/PE 的“大二”。另外, DvC 维度合并了责任性和宜人性两种强的成分。确实,综上所述,这些大五特质仅解释了 DvC 因素分数中总变异的一半多一点。最后,开放性仅仅与 E/PE 有弱相关(.21),并且与其他的大三超级因素完全不相关。

表 16.2 大三和大五因素分数之间的相关

大五因素	大三分数		
	N/NE	E/PE	DvC
神经质	.83	-.14	-.08
外倾性	-.10	.78	.09
责任性	-.08	.19	-.54
宜人性	-.17	.09	-.50
开放性	.03	.21	.04

注: N=327, |.40| 及以上相关用粗体显示。|.14| 以上相关在 $p < .05$ 双向上显著。N/NE, 神经质/负情绪; E/PE, 外倾性/正情绪; DvC, 去抑制对强制。

这些关于责任性、宜人性和 DvC 的数据已引发了一场不断深入的争论(例,



Digman, 1997; Eysenck, 1997; Goldberg, 1993)。大五的支持者从一个极端出发,认为 DvC 维度是对两种不同的相对独立特质进行人为的“拉郎配”。Eysenck(1997)又从另一个极端出发,主张责任性和宜人性代表了 DvC 超级因素的低阶成分。虽然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面讨论已超越了我们这一章的范围,我们还是必须强调没有一种极端观点能够提出对这些数据的完全令人满意的解释。

Eysenck 论点的问题在于,不可能把所有与责任性和宜人性相关的内容都归结为一个单一的高阶维度。例如,我们从 NEO-PI-R 中抽取出宜人性和责任性方面进行主成分分析,但是没有找到足以证明存在着一个单一的一般因素的证据;实际上,谦虚和心地仁慈量表在第一次未旋转的因素中,负荷都在.20 以下。而且,虽然 DvC 因素得分表现出同责任性(例如,与责任感的相关系数 $r = -.52$,与深思熟虑为 $-.52$,与自律为 $-.45$,与渴求成功为 $-.43$)和宜人性(例如,与坦率的相关系数 $r = -.53$,与利他主义为 $-.40$,与顺从为 $-.36$)在大多数方面都有比较强的负相关,但是它与心地仁慈只具有 $-.15$ 的相关。因而,现行的责任性和宜人性(尤其是后者)的测量中包含着不应属于 DvC 维度的内容。

在另一方面,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证实,DvC 维度代表了同宜人性和责任性相关的不同成分的一种人为的、异质的“拉郎配”。为了更详细地检验这个问题,我在 SWU 的本科生的一个非常大的样本中($N = 2,454$)抽取出 35 个 GTS 去抑制项目进行主成分分析。这个分析证实这些项目定义了一个一般因素,可以解释 73% 的共同变异。然而,我们也发现了两个有意义的次因素的证据:第一个看起来与(低)责任性有很大的关系,而第二个似乎与(低)宜人性更相关。因此,我们建构了两个分量表,其项目对每个次因素都是重要的标记:无忧无虑定向量表(Carefree Orientation Scale)和反社会行为量表(Antisocial Behavior Scale)。前者包括七个积极色彩的项目(例如,“我没有花太多精力去注意我的钱花到哪去了”“当我正玩得高兴时,我不担心后果”)和六个消极色彩的项目(例如,“我是一个谨慎的人”“在作决定之前,我仔细考虑问题的每一方面”),而后者包括九个积极色彩的陈述(例如,“撒谎对我来说太容易了”“我就是喜欢违背规则”“我的行为方式总是让我陷入麻烦”)。

根据这些内容,可以预期无忧无虑取向和反社会行为分量表将分别与(低)责任性和宜人性有强相关。我们在我们合成的本科生样本中证实了这一预期。具体地说,无忧无虑取向与责任性因素得分的相关为 $-.67$,与宜人性因素得分仅有一 $.20$ 的相关。相反,反社会行为与宜人性的相关为 $-.50$,与责任性仅有一 $.32$ 的相关(每对之间的相关在 $p < .01$ 水平上有显著差异, p 为双向)。这些结果再一次证明了 DvC 维度包含了大五特质的哪两个特质相关内容。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数据也证明了这两个领域的融合是系统性的、有意义的,而不是人为的。具体说来,无忧无虑取向和反社会行为分量表之间的相关,在最初的SWU原始样本中为.47,而在合成的本科生样本中为.50。而且我们还发现了在后一个样本中有很多NEO-PI-R中宜人性和责任性的方面之间的显著的正相关。事实上,通过建立宜人性(信任、坦率、利他主义、顺从)和责任性(能力、责任感、自律、深思熟虑)的简化的四方面领域量表(four facet domain scale),我们获得这些特质之间存在着.32的中等程度的相关。最后,值得注意的是,Digman (1997)通过对大五量表(外倾性和开放性形成了一种次级元特质)的分析发现,宜人性和责任性一致结合而形成了一种高阶的无限接近于元特质的特质(与定义的另一极的N/NE并列)。这些数据表明Eysenck (1997)的论点不是没有贡献的,一个更大的超级因素可以包含一些(尽管不是全部)与责任性和宜人性都相关的内容。

超越结构效度

一个清晰的结构模型的发展是阐明科学概念重要的第一步。但我们前面曾指出,特质模型已经开始超越结构主义,为人类行为提供真正的解释。在后续的部分中,我们将提供一部分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部分大多来自于我们自己的研究,并且综合呈现大三的每种特质的系统性相关列阵。我们开始于引用心境和气质之间关系的文献,之后,我们刻意回避了那些可以通过共有的心境成分(例如,关于生活和工作满意度的众多文献)直接或在很大部分上解释同气质的相关的变量的数据。接下来的一部分总结:(1)支持这些特质存在的积累的基因证据,(2)近来的结构-功能生物学模型,(3)影响特质稳定性和变化的因素,以及(4)与精神病学的关系。

大三特质的相关

心 境

如前所述,大量研究资料将N/NE和E/PE与情绪体验中的个体差异联系起来,在这一点上可以视情绪为这两种维度的一个核心,即使不是仅有的核心。更明确地说,心境也表现出两种主要维度,通常分别标记为负面感情和正面感情(参见Watson & Tellegen, 1985)。负面感情(NA)是一种主观痛苦感觉的一般维度,涵盖了大量的特定的负面情绪状态,包括恐惧、悲伤、愤怒、内疚、耻辱和憎恶。相比之下,正面感情(PA)反映了各种各样同时发生的正面情绪状态,包括快乐、兴趣、注意、兴奋、热情



和自豪。

尽管这些各种各样的特定负面(或正面)心境状态存在着概念上的区别,但实际上,它们同时发生于个体内部和个体间以形成一般的(即高级的)负面(或正面)感情维度,这是可以完全确定的(Diener, Smith, & Fujita, 1995; Watson & Clark, 1992a, 1992b)。可以从对心境评价的范围广泛的术语、公式和时间构架(例如,从暂时的心境到过去一年的通常的心境)中获得(Watson, 1988)这两个高度稳定的心境维度,这也可从多元的文化和多种语言中获得(例如, Balatsky & Diener, 1993; Watson, Clark, & Tellegen, 1984)。应当着重指出的是,尽管它们的标记听起来是相反的,但这两个维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互不相关的,即它们代表了受不同的外部变量(Clark & Watson, 1988, 1991)和不同的内部生物系统(Clark, Watson, & Leeka, 1989; Depue, 1996; Depue & Collins, 出版中)所影响的独立的生物心理社会维度。

从普通情况到高压情景,高 N/NE 的个体在任何实际的情景中都报告了更高的 NA 水平(例如, Watson & Clark, 1984)。反之,高 E/PE 的个体在各种广泛的情景中都更可能报告更高的 PA 水平(Watson & Clark, 1992b, 1997)。的确,如同刚才所说的,可以认为 N/NE(或 E/PE)维度的一个中心特征就是更经常和更深刻地体验 NA(或 PA)的倾向性(Tellegen, 1985; Watson & Clark, 1984, 1992b; Watson et al., 出版中)。虽然通过上述的研究(以及其他的研究)的各种方法也可以很好地确认这些关系,但我们还是忍不住要呈现用另一种方法获得的其他的数

407 据来对此加以证明。表 16.3 中的数据取自对在不同时间跨度内重复完成心境和活动量表的大学生所做的四个纵向研究。通过 20 个项目的正面和负面感情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hedule, PANAS)(Watson, Clark, & Tellegen, 1988)而获得对心境的评定。被试要评定他们所经历的每种心境状态(NA 和 PA 各 10 种)在 5 点量表(从非常微弱或完全无到非常强烈)上达到什么程度。表 16.3 中的心境评定代表了被试“今天”的心境(样本 1 和 2)、“过去几天”的心境(样本 3)或“过去一周”的心境(样本 4)。要计算出在每个样本中每个参与者在整个评价期间内的数据的平均值,并产生总的平均的 NA 和 PA 分数。大三分数来自 GTS(研究 1 和 3),这些分数还代表了通过结合 GTS 和 EPQ 而计算出的(样本 2)因素得分,或者通过 GTS、EPQ 和 CPI(样本 4)而计算出来的因素得分。表 16.3 中的数据证明,不管以哪一种时间构架进行测量,或者以哪一种方式获得大三分数,NA 和 N/NE 都有着一致的强相关,与 E/PE 在很大程度上无相关,与 DvC 有微弱的相关。反之,PA 和 E/PE 有着一致的强相关,与 N/NE 或 DvC 均在很大程度上无相关。N/NE 和 E/PE 非常明显并简明地把气质维度的原型定义为情绪上的个体差异。

